

武术

身体的文化

WUSHU SHENTI DE WENHUA

戴国斌 著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之一

WUSHU WENHUA YANJIU CONGJI

人民体育出版社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6BZH01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06ZS54）、上海市重点学科（S30803）资助，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入围奖。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之一

武术：身体的文化

Wushu: The Culture of Bodies

戴国斌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术：身体的文化 / 戴国斌著.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之一)

ISBN 978-7-5009-4019-7

I .①武… II .①戴… III .①武术-研究-中国
IV .①G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709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

880×1230 32 开本 16.5 印张 378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978-7-5009-4019-7

定价：35.00 元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8 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邮购：67118491

网址：www.sportspublish.com

（购买本社图书，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



作者简介



戴国斌（1963—），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办公室主任。自幼习武，挥汗如雨于竞技武术的训练场，获江苏省武术比赛少年拳术冠军等成绩；青年志于学，在完成大专、本科函授后，相继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上海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学位，完成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博士后研究。

2000年以来，发表论文近30篇，参与8本教材的编写和其中5本教材的统稿工作，主持与参与10余项课题研究。其中，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等研究。研究成果先后获全国武术论文报告会一等奖（2003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4、7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6年12月，2009年12月），“十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等奖（2006年9月），博士论文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入围奖（2007年12月）、博士后研究报告获优秀结论并经华东师范大学推荐被《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2008年12月）。



摘要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武术是一项身体的文化实践，不论是套路还是散打都不是自然行为，而是“人文化成”的表现，是对军事格斗行为文化的结果。为了检验该假设，本研究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和《性经验史》等文本中阐发的“知识/权力”与身体规训理论，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等文本对暴力的剖析等，斯科特“弱者抵抗”的微观研究、中国学（如柯文）对中国研究的态度和中国学学者（如法国的白吉尔、美国的孔飞力、中国的张仲礼等）关于近代社会精英的研究，李汉林等在《中国单位社会》中关于“单位”现象的分析，以及近来（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中流行的身体理论和视觉文化等加以综合考察，反复论证本研究的基本主题：武术是一种身体的文化，本研究的不同章节也可以看成是对这一命题不同的延伸和展开。本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身体的文化中，武术有了文明的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因素和天下主义的影响下，武术的“打”改变了对“力”的态度。不仅拆解了“武”与“力”的联系，而且还认为“胜之不武”的批评，透露出“神武不杀”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在实践上，也通过一系列替代，取代了双方身体的直接接触，将军事杀伤致命的暴力性行动纳入文明轨道；并以主体身体“苦行僧”的锻炼提高了武术主体



对挫折的耐受力，以替代性行动和象征性行动释放了本能性的技击冲动。

第二，在身体的文化中，武术承担了一定的伦理责任。一方面，通过对拜师者的伦理考量（入学的伦理考试）、一次考试的长期化、祖辈三代的伦理调查以及送师引师等编制外道德监督，以强大的外在力量形成主体的自觉节制；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体将这些作用的内化，在学会按照武术的技术文化来看自己动作的同时，也学会按照武术道德要求来改造自己的身体，形成主体不自觉的节制。

第三，在身体的文化中，武术有了理想的向往。不仅从技击的可能性、理想性和想象性体现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解放”力量，而且也形成了技击“刚柔相济、对称协调、身心兼备”的乌托邦样态。

第四，在军事格斗行动符号化的过程中，武术形成了套路/散打两套编码方式和“演/打”两种文化形态。它们不仅在动作的数量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具有不同的身体编码和解码方式。

第五，武术也文化了比试活动，一方面，通过“物对手”的文化，使武术比试通过共同作用于某物换算出彼此功夫的高低；另一方面，以“人对手”的处理，如陪练的象征性对手、对练的虚假对手、单练的想象对手，使武术比试呈现新态：“小动作”的含蓄性比武、“说招”的言语较量、“演练”的功力度量。

第六，近代以来，社会精英以其在中国现代化前沿阵地练就的胆识，将武术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也通过立法等手段使武术由庭院村落迈开了进军学校、军队、社区、运动会等步伐。





第七，武术门户，虽然有着近代社会精英所批判的消极性，但门户的消极中也有对新体验探索的积极性，是武术文化景观之一。因为，门户不仅是我国传统家族文化和家族组织与制度在武术领域的表现，而且也是我们学习、传播武术的载体，是武术发展繁荣的标志。

关键词：武术；文化；身体；文化研究



ABSTRACT

The hypothe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fundamental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is that wushu, including taolu (Routine, Set Pattern) and sanda (Free Combat), is not a natural activity, but a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body, a form of humanity science and the result of civilizing martial combats. In order to prove this hypothesis, the present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the conception of “power / knowledge” and the popular body Theory elucidated by Michel Foucault in his cultural studies such as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analysis of violence made by Zygmunt Bauman in his book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the micro-study of “resistance of the weak”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conducted by James Scott, the attitudes of Sinology,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elites conducted by China Studies scholars, the interpretation of “unite” phenomenon in the book Chinese Unite Sociology, and the popular Body Theory and Visual Culture in recent worldwide cultural studies. The primary proposition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Wushu is a



kind of body culture, which is extended and explored in different chapters of the research.

Major conclusions:

1. Wushu appeals for the civilization in body culture.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lism, wushu changed its attitude towards power, which not only dismantl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wushu and power but also indicates the ideal of conquering the enemy without martial efforts (breaking the enemy's resistance without fighting). In practice, wushu brings the violent martial combat activities into the orbit of civilization by replacing the direct touches of bodies through a series of replacements, improves the body's endurance through tough practice and releases the instinct sparring passion through substitute and symbolic acts.

2. Wushu also assumes certain ethic responsibility in body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subject forms the self-discipline under the powerful social influence such as the entrance ethic examination, the long-term assessment, and the eth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amily and the moral supervision of the master.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evaluating self-acting according to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 of martial arts and learning the ethical investigation input, the trainee acquired self-discipline unconsciously by reshaping their own bo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ushu morale.

3. Wushu pursues its ideal in the body culture. The pos-



sibility, ideality and imagination of sparring techniques in Wushu indicate the subject's free will and the power of emancipation, and shape the Utopian state of "temper force with grace, symmetry and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in the culture of Jiji (Technical Combat) .

4. In symbolizing martial combat into wushu acts, wushu is divided into two coding mode, i.e. taolu (Routine, Set Pattern) and sanda (Free Combat), and two cultural patterns, i.e. performance and sparring. They are different in both the number of acts and the mode of coding and encoding.

5. Wushu competition (fight hand in hand) is evaluated by means of "material opponent" on the one hand, and "human being opponent"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s "a symbolic opponent" in training partner, "a false opponent" in Sparring (pair exercise) and "a imagined opponent" in single practice, the implicit competition of "minor movement" (indistinct action), argument of "talking movement" (a movement in wushu) and power competition through performance civilized wushu competition.

6. With the courage cultivated in the front line of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 elite associate wushu with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ave its way to school, army, community and sports meet from courtyard by lawmaking.

7. Though criticized by the modern social talents for its negative effect, wushu school is positive in exploring new experience, taking on a band-new look in wushu culture, because



this phenomenon is not only a refl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culture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 in wushu field, but also a carrier for us to learn and spread wushu, and a mark of wushu prosperity.

Key words: Wushu (Martial Arts); Culture; Body; Cultural Studies



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认为对于一名博士研究生而言，学位论文的根本在于培养一种创新精神、创新品格，至于调查、问卷、访谈等基本研究方法应在硕士阶段掌握，不应作为博士论文价值的重点。所谓创新，首先是观念上的创新，也就是敢于去做风险性课题，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牺牲精神，而不是得过且过，求个“四平八稳”，只要评委能通过则万事大吉。在开题后有人曾劝说过戴国斌：有争议的问题等博士论文通过、毕业之后再写，保个平安。借此，我也衷心希望评委专家们，能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博士论文中的标新立异，不要凡是与自己的观点不同便一棍子打死。随着历史的推移，又有谁能保证评委的观点一定是对的，博士生的观点一定是错呢？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武术，如何在强大的奥林匹克话语权中找到自己？如何在奥林匹克全球化中谋求自己的发展？这是当代武术实践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武术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戴国斌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正是从这些问题入手，并提供了一份有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的回答。国斌之著有许多值得推荐和学习的优点，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第一，将中国武术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用宽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去探索它，从而使武术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国斌没有循规蹈矩，他打破了以武术研究武术的方法，跨越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历史，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综合了几种方法，开拓了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上篇近代武术话语的爆炸，选取了武术研究较少涉猎的社会精英问题作为切入点，运用了汉学家对中国社会精英的研究、当代人文社会学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中国学者对中间阶层的思考，以及翔实的史料，使他的论文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当然，在理论的综合运用中也贯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性”的理解与近代武术发展总体趋势“政治化”的学术定位。中篇武术现代化遭遇的问题，他从武术界“老问题”入手，运用了中国社会学家李汉林关于中国社会“单位”现象的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社会学分析视角，对武术门户问题，打/演与套路/散打问题，比试问题进行了有学术深度的分析，也使“老问题”呈现新意。下篇作为文化实践的武术，聚焦于武术文化个性，在全球化现实中试图恢复武术的历史记忆、连接武术发展的传统，重新唤起武术的民族信心，在立意上居高思远，在学理上有新突破，在结论上呈新见解，也是该论文的精彩章节；如在理论运用上不仅有福柯的身体规训、鲍曼对暴力的分析、视觉文化以及人们对乌托邦的新解，而且对武术文明化、伦理化、理想化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贯穿其中的是他对传统社会武术发展的“社会化”认知。

第二，在问题意识中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近代社会精英将庭院村落武术发展成为国家大事的溯源性研究中，有着研



究者对当代民间武术发展的思考；当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中国社会急需培养中间阶层之际，国斌思考的是民间武术发展的组织者问题；也就是说，该书对近代社会精英于武术天地掀起的历史风云的描述中潜伏着这样的研究脉络——民间武术组织者（即谁来发展民间武术？怎样发展民间武术？）的理论探讨。在武术现代化遭遇的问题研究中，其实也是对武术界关于套路和散打两种文化形态的一次学术梳理，并对人们在评价套路时的散打尺度以及评价散打时的套路尺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回答。同时，也以武术比试的文化回应了散打的胜负标准和民间武术的技击中心。在下篇武术文化个性的探寻中，其文明化、伦理化和理想化的总结回答了当下武术发展面临的问题：竞技武术的民族性问题、民间武术的文化性问题，不仅有他对当代武术发展路径的思考，而且也为武术教育改革（即以武术教育学生要以什么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影响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有深度的理论依据。

第三，在研究结果上也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有了观念、方法的创新，还要敢于提出新的观点，破旧立新、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才是博士论文和武术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国斌在解析武术本质时提出：武术是文明化的产物，体现了人类格斗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化；武术是伦理化的产物，由制人到制己，讲究“仁”和礼；武术是理想化的产物，它以种种假设创造出奇妙多变的攻防技艺，表现了中华民族灵便的智慧。国斌的“三化”令我备感欣喜，这一创新观点，看似平常，却是一语中的，细究起来，确也入木三分。其中，最最引起我兴奋的是他提出了武术套路的“乌托邦样态”，正如王阳明曾评价中国人审美情趣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国斌对套





路乌托邦的分析，正在于希望人们重新认识武术曾经拥有的理想，提醒人们当代武术文化生产同样需要有梦：“用技击的理想感染人，以技击的想象吸引人。”可惜该部分阐述和论证少去了很多，也可能有一些心有余悸吧。

国斌是一个为人谦和、勤奋好学的学生，也是一个学术初成、很有潜力的学者。在经历了大专、本科函授后，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在硕士毕业后顶着持续6年学习的经济压力来上海体育学院攻读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学位，并于博士毕业不久（2005年12月）申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武术的文化生产》研究。值得庆贺的是，国斌的博士论文于2007年12月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7月其博士后研究在出站时获得优秀结论，并被华东师范大学推荐《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他的研究也得到了体育界和人文社会学界的认可，我们一起成功申报的国家体育总局软科学课题，在结题时获得优秀结论，并于“十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专项奖评选中获得二等奖；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获得良好结论，他的研究成果还先后被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2届学术年会文集收录、在第3届学术年会作报告、获得第4届和第7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在这样的学生、这般学术追求面前，一个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劳动成果进行评点、作序，难免无爱屋及乌的成分，至于这一成分有没有影响到我的判断，还请读者心中的天平来权衡，好在国斌的博士论文现已出版，放到了读者面前。



最后，祝国斌在学术道路上再上新台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是为序。

国务院第5届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
中国武术九段

2010年6月



前 言

一、问题提出

问题❶，是研究的起点和开始。导致本研究的“问题”是“当代武术文化生产应该怎样定位”？在武术的文化生产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保持与体现什么？这一问题的求解依赖于以下一些问号的解答。第一，关于“武术”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军事活动之外又诞生了武术？如果武术的目的也是“杀人”的话，那么它是以更为科学、更为有效区别于军事，还是以模拟和向导作为军事的初阶？在武术的历史发展中，它有没有形成与其他国家民族武技不同的地方？武术在发展中形成了套路与散打两种文化形态，那么，单用散打之打能否完全解释武术现象？套路在武术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第二，关于“散打”的系列问题——散打“中美对抗赛”等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武术

❶有人将“问”看做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之一。“问”不仅带来研究，是研究的前奏，而且也是研究的结果，研究又会生发出许多新“问”。“问”不仅是“学”之不可或缺的组成，有“学问”之说（学会提问，问什么、如何问也就成了学术能力的表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问”的系统化（如提问、立问、展开问题、回答问题等）也形成了“学科”这一“问”之果。